

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雕塑的社会功能与当代意义

伍 珩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大同云冈石窟是北魏时代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见证。从审美人类学角度把云冈石窟放在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不仅仅考察当时的“语境”,同时也考察云冈石窟在现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反映的审美现象,考察其在北魏时期以及当代社会里作为雕塑作品的社会功能与意义。

关键词:云冈石窟寺; 雕塑; 社会功能; 意义

中图分类号:J3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20(2011)02-00011-04

云冈石窟是中国第一座石窟的开凿和佛像的雕塑都在山体上进行的巨大石窟群,原名武周山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郊处,石窟倚山面水。东西绵延有一千多米,现存洞窟有45个,造像51000余尊。它是中国石窟群中最大的石窟^[1]。本文将论述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作为一种雕塑艺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古代的雕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作用于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力。

一、北魏云冈石窟修建与政治话语控制

北魏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北魏鲜卑人建立王朝开始统治,其后又一统北方。北魏建立王朝以后,迁都平城(现在的大同)。在十六国时期,佛教就已经在中原开始传播,并且形成佛教文化中心。北魏政权建立以后,政治中心转移到平城,拥有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资源。大批能工巧匠也随之聚集在此。《魏书》曾记载“凉州之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的其旧式,村郭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北魏平定凉州,佛教中心开始转向平城,国人也随之迁徙到平城。平城成为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云冈石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建造。

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要达到对比自己民族先进的群体的统治,必须实施汉化政策。因此“为了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对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人民实行统治,需要一种宗法性宗教

显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2]来自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信仰,并且通过自己的政权把这种信仰在它的国土范围之内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佛教信仰是其显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方法之一。北魏时期,佛教在国民的宗教信仰上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佛教宣扬人在现实生活中受苦是为了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为了来世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信奉佛教可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人皆可成佛”。一方面,在普通百姓身上艰苦的生活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享乐的机会,加上战乱更是民不聊生,佛教信仰却能够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寄托,使他们安于贫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通过压榨农民阶级来取得财富,自己的幸福生活可谓是在广大农民的痛苦之上,信奉佛教可以使他们心灵中的罪恶感得以缓解和减轻,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佛教在这些方面满足了这两批人的精神上的需求。宗教本身作为一种信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制度化了的宗教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与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它来巩固其统治。

云冈石窟是国家政权参与修建的一个石窟寺。从北魏在大同建立政权,直至迁都洛阳,北魏政权以及富有地主在大同云冈修建了很多石窟。这些石窟里除了有雕刻的佛像,还有供养人自己的刻像,以此来表达供养人对于神佛的敬畏。云冈石窟开凿的选址在当时皇帝祈福的灵山——武周山^[3],最早的石窟始建于公元460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昙曜五窟。虽然石窟寺的雕刻一般是以佛经原典中的故事为原型,但是从昙曜五窟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与

[收稿日期]2011-02-16

[作者简介]伍珩(1987—),女,安徽芜湖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审美人类学、文艺学。

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据历史记载,昙曜本人根据“礼佛即拜皇帝”的构想开凿石窟,“这次大规模的开凿云冈石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帝王画石像,凿成的昙曜五窟从16到20窟依次代表的是神元皇帝、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和文成帝以后未来世的拓跋诸帝。”^[4]此外,北魏后期随着皇权的迁移,富人也开始在云冈石窟附近开凿一些小的石窟寺,并且也雕刻有自己的供养人像,以此来祈求神灵的佑护。从魏文帝复法开凿石窟寺开始,到迁都洛阳,一直有人在武周山兴建石窟寺。从象征皇权的大型昙曜五窟,到后来由于修建者自己财力不够而修建的较小的石窟寺,云冈石窟作为佛教在北魏时期在中原地区传播的见证,佛教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权力上的象征。

北魏时期佛教的传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北魏政权曾经采取过灭佛的行动,但此后的统治者又开始信奉佛教,佛教才得以传播下去。兴佛与灭佛,看似与统治阶级的信仰有关,但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广大群众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在封建社会里,佛教往往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麻痹群众的工具。北魏政权建立之初统治者急需为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基础,大力推行佛教是巩固其政权统治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策略。在大兴佛教之时,北魏政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僧官制度对僧人进行管理。魏文帝复法,昙曜奉旨开凿石窟寺,从昙曜五窟的佛像雕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被雕刻出的巨大的佛像,实际上是以皇帝的形象为依据的,这样皇权就与人们信仰的佛联系起来,至高无上的皇权得到佛祖的庇护,或者说皇帝就是佛祖在人世间的化身。关于艺术品在政治中的作用,罗伯特·莱顿在《艺术人类学》中认为“艺术品在政治体系的互动模式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艺术品被具体表达出来的观念似乎不只是对政治体系的一种被动的反应,还是对政治权威本质及其在世界的地位的哲学反应”^[5]。云冈石窟的佛教雕像以皇帝为原型,实际上是把皇帝上升到神的位置来供人们崇拜和敬仰,是在信仰上使群众屈服于皇权。统治者成为佛在世间的化身,如此,信奉者们在跪拜神灵祈求佑护的同时,也是再向统治阶级低头。佛像雕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外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了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统治。在统治者看来,佛教现实功利目的远远大于它的信仰目的。

除了兴佛的历史事件外,在北魏历史上还有大规模的灭佛行动,这些行动更能看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佛教雕塑作为一种艺术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佛教从西域传播进来以后,信众很多。《魏书》记载北魏太武帝时期由于佛教的势力发展过快,对北魏统治造成很大的威胁。太武帝为此实行了灭佛的政策,改信道教。在灭佛事件中,赶僧尼、烧经书,可

谓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无一幸免,史称“太武法难”。“太武法难”虽然没有给佛教在中原的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太武帝以后佛教又再次得到恢复,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作为加固其统治的工具,他们可以根据统治需要对佛教或兴或灭,甚至改选道教或者其他门类的宗教。

二、石窟寺雕塑作品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

大同云冈石窟的艺术成就一直以来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它把开凿石窟与雕刻佛像相结合,其雕刻的难度和佛像所给人的震撼,使我们感叹当时匠工们的技艺超凡。但是,从云冈石窟的遗址看了,除了昙曜五窟是由僧人昙曜主持开凿,以及石窟旁边的碑和供养人的塑像之外,对于雕刻这些杰作的民间匠人我们却一无所知。而他们代表的是北魏时代的雕刻水平,和那个时代的艺术发展水平。北魏时期,民间匠人地位卑微,他们在石窟寺的开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云冈石窟寺是那个时代群众集体的智慧的结晶。

云冈石窟的雕塑中有巨大的佛像、保卫佛的护法佛像、描绘佛本生故事的画面,以及用来供奉的佛龛,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都极具艺术价值。云冈石窟寺中比较出名的昙曜五窟之一,第20窟露天大佛被称为云冈石刻的象征。佛像为释迦坐像,高13.7米,主佛依旧保存完好,因为石窟部分塌毁,主佛直接呈现在外面,造型气魄宏伟,蔚为壮观。佛像周围还刻有站立的佛像,佛像本身造型端正,双耳垂肩,表情祥和,能给人以一种艺术上的美感,雕塑的巨大的佛像,从视觉上给参拜者一种敬畏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佛教塑像本身源于佛教故事。佛教宣扬累世修行,记载了很多佛祖在成佛之前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信众来说也起着一种麻痹作用。阎文儒先生认为“三世纪以后,中原更加流行自然智、无师智,得一切解脱,众生皆可成佛的大乘般若之学。企图证明客观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从而彻底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幻化出一种精神世界,创造出弥勒和阿弥陀二净土世界,并以此来欺骗人民,说这二净土是真正的幸福世界。”^[6]阎文儒先生的这段论述揭示了统治者如何利用佛教故事来麻痹人民的事实,佛教很多内容都是佛祖在前世受苦的佛本生故事,描绘出的美好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与统治阶级对百姓安于现状的要求相吻合。托尼·本尼特在《文化与社会》中指出“解读事物表面之下的东西从而发现隐藏的意义与含义的联系”^{[7]225}。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不仅仅表现在艺术品的价值之上,还蕴含在雕塑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功能。云冈石窟各时期雕塑的变化显示了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原的传播情况,也表现出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本土化的过程。石

窟寺的开凿是北魏统治阶级将其政治话语扩张到百姓日常生活领域的一个手段,是北魏统治阶层强化其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重大举措,石窟寺雕塑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

三、云冈石窟的发展及其当代意义

云冈石窟在北魏时期作为佛教建筑,与社会政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时至今日,云冈石窟作为现存的历史建筑与当地的地方政府也有着特殊的关系。从重视石窟寺的功能性价值,到现在的重视其艺术和审美价值,云冈石窟在今天又有着新的发展与意义。

云冈石窟“代表中国5到6世纪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在2001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目前,云冈石窟被大同市列为旅游景点,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一张王牌。大同煤炭资源较为丰富,被称作“中国煤都”,同时由于佛教雕塑众多,也被称为“中国雕塑之都”。靠煤炭来发展城市是属于资源消耗型,旅游业是属于能够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的第三行业。近些年来,旅游业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一个重点。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1995年开始把云冈石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学校组织中小学生进行参观;2000年开始,举办云冈旅游节。据报道,云冈旅游节期间平均每天接待4000人次,并且借助旅游节,招商引资8亿。可见,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云冈石窟,在本地政府的合理开发下,成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当地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也十分重视。2009年10月,山西大同大学举办“云冈文化论坛”,学者们从历史发展、艺术价值、文物保护等视角对云冈石窟的佛教塑像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扩大了云冈石窟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山西大同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云冈石窟研究所,对云冈石窟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尽管云冈石窟的研究相对于敦煌石窟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但当地对于云冈石窟研究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冈石窟的深入挖掘研究。

云冈石窟在北魏时期是作为宗教场所而存在,它代表的是北魏时期人们的智慧和艺术水平。如今,在当地文化发展中,云冈石窟成为一个地域的代名词,当地以“中国雕塑之都”作为城市名片之时,云冈石窟昔日的佛教色彩已经淡化,其艺术价值正日益提升。托尼·本尼特在论述王室收藏时指出“把世界

再创造成围绕王室为中心的人物的世界的缩影,这样他们就像在现实中一样声称象征性的统治世界。”^{[7]225}云冈石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北魏人们对佛祖的祭拜和封建皇权的敬畏。在当代社会中,皇权已经不复存在,作为王室开凿的石窟寺,其象征性的统治的隐喻已经不存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云冈石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游客观赏的对象。这些游客是否都是佛教信徒,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从旅游景点的开发来看,它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当地政府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基于它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此外,从大同旅游文化节的设立来看,文化节是大同为了宣传自己的旅游文化而开展的大型主题活动。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在旅游节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云冈石窟,至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从北魏时期的佛教场所到今天的旅游景点,石窟寺一直都在发挥着它的社会功能。其最初是作为皇权的象征,用以“显示皇族的权威、寄予来世的祈祷,以及对神灵的膜拜”^{[8]276},或许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雕塑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实际上却成为统治者加固其统治的一种方式。时至今日,云冈石窟已经不再是当时的佛教圣地,其艺术价值正日益凸显,受多元文化融合影响而产生的云冈石窟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一种象征。

【参 考 文 献】

- [1]冯贺军.中国古代雕塑述要[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14.
- [2]高云美.云冈石窟的开凿与北魏佛教的传播[J].中国校外教育,2008(1):52.
- [3]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
- [4]张森.昙曜兴佛及其历史地位[J].五台山研究,2005(3):4.
- [5]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0.
- [6]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0.
- [7]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8]季峰.纪念碑、偶像、符号与公众艺术[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9):276.

(责任编辑:雷文彪)

(下转第18页)

妾,自然也要解决住房。内弟卢遵元和四年出任桂林全义县县丞,有政声,旋即弃官返回永州也需建房成家。这从柳诗《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中可以得到印证。崔中丞即永州刺史崔敏,曾任衙史中丞,乃朝廷大僚。卢少府即卢遵,县令称明府,县丞称少府。郊居指卢遵建在潇水西岸的寓所,“寓居湘岸四无邻”。很有可能,“愚堂”让给了宗直,柳自己另建新

房。

三是经营田园、种植果树的需要。他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中说:“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俨然又一个陶渊明。刘禹锡《伤愚溪三首》中有“木奴千树属邻家”,柳种植的柑橘有上千棵,可见住所背后是多么开阔。

(责任编辑:雷 凯)

On Liu Zongyuan's Dwellings in Yongzhou ——from Longxing Temple to Cattage at Yuxi

LV Guokang

(Yongzhou Education Bureau, Yongzhou, Hunan, 425000 China)

Abstract: Known from various literatures, three dwellings Liu Zongyuan had lived in Yongzhou for ten years, which Longxing Temple on the east bank for the first four years, the Yutang and Cattage at Yuxi for the rest six year, among which the Yutang for one year and its specific address is likely to be located at the Liuzi Street the author inferred.

Key words: Liu Zongyuan; Yongzhou; dwellings; Yutang

~~~~~

(上接第7页)

# On Aesthetics of Zhuang Brocade

PENG Y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Educational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23 China)

**Abstract:** The Zhuang brocade, a traditional folk artwork with a long history, has distinct national aesthetic features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terior aesthetic features from its designs, colors and textures, and explores its internal aesthetic connotations.

**Key words:** Zhuang brocade; aesthetic features; aesthetic connotation

~~~~~

(上接第13页)

On Social Function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Sculptures at Yungang Grottoes of Datong

WU 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sculptures at Yungang Grottoes of Datong are the witness of Buddhist culture transmitted and developed at North Wei period. Having put Yungang Grotto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ulture in perspective of the aesthetic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text of sculptors at that time and the aesthetic phenomenon of Yungang Grotto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social culture, and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sculptures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Grottoes Temple of Yungang; sculpture; social function; significance